

# 第一篇

## 历史的转折 伟大的转变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评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的：“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sup>①</sup>1982年6月邓小平对这次会议作了这样的评价：“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sup>②</sup>1984年6月，邓小平在谈到这次会议的作用时指出：“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

<sup>①</sup>《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sup>①</sup> 1989年12月，邓小平再三叮嘱，要永远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们一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sup>②</sup> 1992年初，邓小平又一次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sup>③</sup> 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是历史性伟大转折的会议。20年历史事实证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巨大的贡献和最大的意义，就是开辟了党的历史的新时期，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和邓小平理论。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第一章 伟大转折的前提和契机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是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的前提条件，它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但是，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党中央没有能在根本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多年来党内的“左”的错误。而担任党的主席的华国锋以“毛泽东的继承人”自居，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更为严重的是，华国锋上台后，仍然提出要“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仍然认为“四人帮”不是极左派而是极右派，仍然坚持要继续“批邓”等，并最终提出其核心理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使我们的事业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因而不能真正实现历史要求我们党的伟大转折。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对“两个凡是”批判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思想准备。

### 一、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 为实现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

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

标志，历时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亿万人民欢呼中国共产党割去了身上的毒瘤，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历史性伟大胜利。

人民的欢呼，胜利呐喊，激动的泪花深深地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真诚热爱和信赖。人们深深懂得，中华民族有过辉煌，也有过屈辱，在中国近代历史的画卷里，多少仁人志士为振兴国家和民族，壮志未酬，抱恨终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走上了振兴的道路。中国人民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结束了中华大地“百年魔怪舞翩跹”的黑暗世界，驱走了“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凄凉景象。历史告诉人们，打碎一个旧世界难，建设一个新世界更难。如何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也是面临的一个空前的重大的难题。为了突破这一重大难题，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早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三大改造”即将胜利的前夕，就开始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尽管他们抱着巨大的而美好的愿望，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还是未能避免“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误与挫折。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这是一个历史的契机，它预示着一个寻求新的发展道路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历史任务是，如何认真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教训，纠正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彻底地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恢复国民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准备、创造条件。但是 1977、1978 两年中，中共中央以华国锋为代表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倾错误，坚持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特别严重的是提出“两个凡是”的理论，因而出现了党的工作徘徊的局面和社会主义建设决策的失误，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

1976 年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中国人民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唐山的强烈地震，不仅给唐山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且也为全国人民增加了思想和物质的负担，不得不以极大的力量投入抗震救灾中，不少地区的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更严重的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以及把人民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去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行动打成“反革命事件”，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所以 1976 年的工农业生产就全国来说虽有发展，但十分缓慢。

但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人民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和力量，一致行动起来，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而努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稳定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1977 年 2 月，国务院召开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确定全国铁路运输任务。会议研究了铁路管理体制问题，强调全国铁路由铁道部集中统一指挥。3 月，中共中

央又召开计划工作会议，分析国内经济形势，制定 1977 年的经济发展计划。会议批判了“四人帮”对经济工作的破坏罪行，划清了各种是非界限和政策界限。会议针对当时经济领域中严重存在的混乱状况，提出了要不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要不要搞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积累、要不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要不要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要不要引进新技术、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等十个问题，批判了“四人帮”在这十个问题上的各种谬论，划清了是非界限，这对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议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工作会议，讨论了 1977 年经济发展计划。同月，国务院转发了国家计委、财政部、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的《关于坚决压缩和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请示报告》，要求各单位、各部门、各地区坚决执行，把 1977 年的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总额控制在 100—110 亿元以内，比 1976 年压缩 15%—20%；4 月，国务院召开冶金工作会议、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讨论整顿企业问题；7 月召开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8 月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10 月，召开全国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等。

上述一系列会议的召开，目的是要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克服和扭转工农业生产下降的局面。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1977 年的国民经济开始有了好转。但是 1977 年的经济工作中严重地存在着“左”的错误，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估计不足，没有认识到严重比例失调的情况，在经济略有好转的情况下，就盲目地提出了国民经济大发展的计划。

1977年1月，国务院将《关于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转发给各地区和各部门，要求贯彻执行。但是，这个报告脱离了“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后的中国经济实际，在“左”的思想的指导下，不去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农村经济政策，使农民休养生息，提高生产积极性，而是主观地决定以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报告要求到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使农、林、牧、副、渔的主要作业机械化的水平达到70%左右，化肥年产量需要增长一倍左右。7月至8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要求大干快上，掀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要求到1980年实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会后各地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和组织，到11月全国有8000万人投入建设，开工的工程有39万多处。这在当时，动员如此多人，全面铺开农田基本建设，严重地增加了国家和农民的负担。而且在“大干快上”的口号下，工程质量低劣，浪费严重。1978年1月，国务院又召开第三次农业机械化会议，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仍然坚持要在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计划。这些会议和计划虽然都是由国务院主持进行的，但它们反映了党中央的指导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

党中央的“左”的指导思想还表现在1977年11月至12月期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会议夸大地估计了当时略为好转的经济形势，讨论了1978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以及今后的经济发展计划。会议确定的生产建设指标和奋斗目标，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也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这主要反映在国家计委向党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经

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要点提出，今后 23 年，即从“五五”计划到“九五”计划期间，在经济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五五”计划的后 3 年，重点打好农业和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两仗，为“六五”计划大上作准备；第二阶段，在“六五”期间，各项生产建设都要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到 1985 年，钢产量为 6000 万吨，原油 2.5 亿吨，计划兴建扩建 120 个大项目，其中有 30 个大电站、8 个大型煤炭基地、10 个大油气田、10 个大钢铁基地、9 个大有色金属基地、10 个大化纤厂、10 个大石油化工厂、10 个大化肥厂，以及新建续建 6 条铁路干线和几个大港口；第三阶段，在 2000 年以前，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 1978 年内引进大量的建设项目。可见，这是一个过大过急的计划。

1978 年 3 月，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建委、经委、上海市、冶金部《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县新建钢铁厂，总投资为 214 亿元。在其它引进项目中，以石油为原料的化工成套设备有：大庆石油化工厂等 8 个项目；以煤炭为原料的有：山西化肥厂 30 万吨合成氨装置。这 9 个项目共投资 160 多亿元。除这外，还引进 100 套综合采煤机等 22 个项目，共投资 600 多亿元。这在当时，一下子要引进那么多项目，显然是超过了财力物力，以及技术力量的。由于建设规模庞大，使基本建设投资额猛增。

1978 年计划投资 332 亿元，因扩大项目，盲目地追加基本建设投资，共为 415 亿元，实际完成 395 亿元，比 1977 年增加了 100 多亿元，增长 34.5% 这就促使 1978 年的积累

率由 1977 年的 32.3% 上升为 36.6%。

过分地狠抓钢铁生产。1978 年计划钢产量为 2800 万吨。到年底，共生产钢 3178 万吨，大大地超过计划指标，比 1977 年增加 800 万吨。

由此可见，1978 年大干快上的气氛是十分浓厚的。但是它明显地反映了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又重犯了冒进的错误。这是由于党在工农业生产计划的决策上的重大失误。

虽然 1978 年的工农业的生产有了进一步的恢复，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都超额完成了计划。但是问题还是严重的，主要是工业发展过快，尤其是钢铁工业上得过猛，在一年中增长 800 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同时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是正确的。但是需要恢复、整顿，而不是大规模地扩大计划。面对略有好转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在经济发展规模决策上犯了冒进的错误。这从党的指导思想上说，与 1958 年一样，片面地强调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脱离了中国的国情，超过了国家的财力、物力的条件，引进了大量的项目，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但这次错误的特点是“洋冒进”，急于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究其根源，主要是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没有纠正“左”的错误，没有彻底地批判“大跃进”的错误，犯了主观主义、经验主义、贪大求洋、盲目乐观、强调局部、不顾全局等毛病。这个失误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如不及时纠正，50 年代“大跃进”的悲剧就会重演。然而这种危机当时却被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等掩盖着，但是它会迅速地暴露出来，尤其是引进项目资金远远地超过了国家实际支付能力，以及几十个大项目同时上马，到 1982 年前后会形成一个全国大建设的高峰。这个冲击力是十分巨大的，国家难以承受。对于这点，当时是没有认识到的。所有这些冒进的错误，都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导致了 1979 和 1980 年的巨大的财政赤字，给我国经济建设带来了新的损失。

1977 年、1978 年，由于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但是，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错误，迫切地要求党中央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实事求是地估计“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建设的严重影响以及“四人帮”的破坏，正确地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指导方针，这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供了客观基础和前提条件。

## 二、拨乱反正是伟大转折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sup>①</sup>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才有可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才能迈开步伐。因为“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清理和纠正，人民共和国仍然处于困境之中。清除“文

<sup>①</sup>《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1 页，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就成为共和国面临的迫切任务。

十年动乱留下了大量的政治问题。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尚待重建，各级政权机关的正常运转尚待恢复。“四人帮”瓦解了，但其帮派势力仍然把持着国家机关一些部门和一些地方的领导权力，还在一些地区继续作乱。“文化大革命”前因“左”倾错误而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也需要解决。被颠倒了敌我关系、是非关系需要重新颠倒过来。大批遭受错误打击的干部有待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社会秩序混乱状况亟待改变。

十年浩劫给国民经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70年代前后，正是世界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期。不少国家和地区抓住国内外环境相对稳定，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机遇，加快了本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周边的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地区发展也很快。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正陷于动乱之中，不仅因此丧失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而且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上拉大了同发达国家差距。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秩序混乱，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许多人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重灾区”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方面留下的问题就更多了。

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积累下来的“左”倾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左”的错误被当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或者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一些实事求是的思想、做法被当作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枷锁继续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使不少人思想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许多地区、部门仍然受着派性、无政府主义思

潮的干扰。

显然，如果不能全面地、认真地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打开新的局面；就不可能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解决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能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解决好当代的条件下，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为此，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首先领导了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的工作，着手调整、加强中央一些部门和一些地方的领导班子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从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批召开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事件，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将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事件通知各级党组织，并传达到全党、全国。通知中列举了毛泽东自1974年2月以来对“四人帮”的批评。同年12月10日，1977年3月6日和9月23日，中共中央先后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以大量事实揭露、批判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陷害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罪行，以及他们篡改、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种种表现。全国各地按照中共中央通知，开展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工作。从政治上消除

“四人帮”的影响。

在这同时，各地区、各部门清查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从组织上清除“四人帮”势力的影响，并调整和加强部分党政机关的领导班子。到 1978 年底，绝大部分地区和单位的清查工作基本结束。通过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终于摧毁了这股盘根错节、作恶多年、危害最烈的反革命势力，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领导权。中央还先后派出工作组，到仍处于动乱状态的少数地区，制止武斗。到 1977 年上半年，这些地区恢复了安定的局面。1977 年 7 月举行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他们赖以横行多年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利用了毛泽东的“左”的错误，利用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环境。因此，随着对“四人帮”的揭发、批判和清查工作的深入，广大干部和群众就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左”的错误，这就使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努力遇到严重障碍。

### 三、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大转折 作了重要思想准备

1980 年 2 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

它的重要性。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三中全会的提法，叫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应当承认，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头，起到了一个领导人应起的作用，但这并不是他个人的功绩。然而在粉碎“四人帮”后一度出现了对华国锋的过分宣传，过分突出了他个人的地位和作用。这一切都明显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全党全国人民要求恢复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优良传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将是阻力重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就是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需要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极大勇气；二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之长，错误理论影响之广，不容易在短期内清除；更重要的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顽固地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华国锋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是在 1976 年 10 月，他在听了宣传口负责人的汇报后指出：（1）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2）“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3）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不要去批；（4）“天安门事件”要避免不说。在这里，华国锋不仅提出了“凡是”的思想，而且错误地把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的极左路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第 279 页，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线，当成极右路线，这样越批右，“左”的错误越大。1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座谈会上出现了只批右，不批“左”的现象。12月10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华国锋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推行的是一条极右路线，要批极右，不要批极左，“要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1977年1月中旬，华国锋要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提纲里。在1月21日的讲话草稿中，已经出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接着华国锋又提出写社论，把“两个凡是”稍事修改，写进社论中。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这“两个凡是”的方针，其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是要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最早起来批判“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是邓小平。他在1977年4月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最早提出了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他指出，我们必须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封信虽然很简短，但提出一个根本问题，即如何正确地对待毛泽东在晚年所做出的指示和决策，是以教条主义态

度对待还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呢？“两个凡是”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晚年的指示和决策，它不管这些指示和决策是对的还是错的，都要坚决执行。邓小平则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而不能用不准确的或只适合于一时一地的一些指示和决定来指导工作。邓小平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5月3日，中共中央批发了这封信。在党内传达后，这封信就成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再次指出：“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sup>①</sup>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做体系来看待。我们要

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sup>①</sup>邓小平的这段话，从根本上指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并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而是歪曲了毛泽东思想。只有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在邓小平作出上述讲话的同时，华国锋于 5 月 1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写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他坚持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强调为指导我们斗争的武器。

1977 年 7 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职务。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通过了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的决定。这次全会对进一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以及恢复邓小平的职务上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但是，华国锋在会上的报告中，仍然宣扬“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的理论和政策。针对这一错误，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再一次阐述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9 页。